

中国小说史丛书

# 明代小说史

齐裕焜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萧欣桥  
封面设计 凌瑛如 刘 炜

明代小说史 齐裕焜 著

---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95000 印数 0001—5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518-371-6/I·236 定价：19.00 元

# “中国小说史丛书”

##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b>顾问</b>	刘世德	邓绍基	林 辰	袁世硕	章培恒
<b>主编</b>	安平秋	侯忠义	萧欣桥		
<b>编委</b>	宁宗一	安平秋	齐裕焜	张 俊	杨 忠
	陈美林	陈庆惠	欧阳健	侯忠义	曹亦冰
	黄 霖	萧欣桥	萧相恺		

## 前 言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丛书共十八种，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断代史，计六种：汉魏六朝小说史（王枝忠著）；隋唐五代小说史（侯忠义著）；宋元小说史（萧相恺著）；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晚清小说史（欧阳健著）。第二单元为题材史，计四种：历史小说史（陈熙中著）；世情小说史（向楷著）；神怪小说史（林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曹亦冰著）。第三单元为体裁史，计四种：笔记小说史（苗壮著）；传奇小说史（薛洪勣著）；话本小说史（萧欣桥等著）；章回小说史（陈美林等著）。第四单元为通史类，计四种：中国小说理论史（王汝梅著）；中国小说文化史（黄清泉等著）；中国小说艺术史（宁宗一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黄霖等著）。断代史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经纬结合，力求概括某一时代小说史的全貌；题材史、体裁史重在阐述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及其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或某一体裁的兴盛衰

落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和变化；通史类旨在揭示和探索其发展脉络和规律。通过以上多角度、多侧面、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研究，希冀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等前辈学者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十、六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有继续开拓之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本丛书旨在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开拓和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孕育、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中国小说史》的伟著来。

本丛书在酝酿、规划中，虽也注意到丛书自身的协调和一致，诸如断代史之间的相互衔接，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之间论题重合与交叉时应各有侧重和相互照应，但在各自撰述中有时仍会出现材料的交叉运用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这有的是无法避免的，有的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向支持本丛书的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和接受本丛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以及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学术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

1997年6月

# 目 录

第一章 明代小说与市民文化·····	1
第一节 明代小说鸟瞰·····	1
第二节 在市民文化沃土上成长的明代小说·····	7
第三节 明代小说的历史贡献·····	16
第二章 明前期小说·····	25
第一节 明前期小说概述·····	25
第二节 明前期文言小说·····	27
第三章 《三国演义》·····	43
第一节 史书与讲史的结合·····	43
第二节 “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	49
第三节 拥刘反曹与道德悲剧·····	59
第四节 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	72
第五节 罗贯中的其他小说·····	88
第四章 《水浒传》·····	95
第一节 丰厚的积累，杰出的创造·····	95
第二节 以市民文化为主调的合奏曲·····	104
第三节 传奇式英雄形象的塑造·····	112
第四节 鲜明的民族特色·····	125
第五节 《水浒传》的地位与影响·····	135
第五章 明代中后期小说·····	140

第一节	明代中后期小说概述·····	140
第二节	文言小说的繁荣·····	145
第三节	《列国志传》《杨家府演义》等历史演义 和英雄传奇小说·····	160
第四节	《封神演义》和神魔小说·····	187
第五节	公案小说·····	219
第六章	《西游记》·····	228
第一节	佛经故事向神魔小说的转化·····	228
第二节	自由、智勇、进取的颂歌·····	235
第三节	奇幻诙谐的美学风格·····	248
第四节	《西游记》的地位和影响·····	264
第七章	《金瓶梅》·····	269
第一节	第一部个人独创的长篇小说·····	269
第二节	市井社会的风俗画·····	274
第三节	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	287
第四节	《金瓶梅》续书和猥亵小说·····	302
第八章	明末小说·····	312
第一节	明末小说概述·····	312
第二节	时事小说·····	315
第三节	《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和明末 其他长篇小说·····	326
第九章	“三言”“二拍”及其他短篇小说·····	353
第一节	冯梦龙与“三言”·····	353
第二节	凌濛初与“二拍”·····	376
第三节	《型世言》和其他拟话本小说集·····	390
后    记	·····	402

# 第一章 明代小说与市民文化

## 第一节 明代小说鸟瞰

元末明初是一个风雷激荡、天翻地覆的年代。十四世纪五十年代，反元大起义进入高潮。方国珍、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等相继起义。群雄逐鹿，争雄图霸。经过几年的混战，徐寿辉的天完政权、韩林儿、刘福通的龙凤政权相继覆灭，方国珍则受了元朝的“招安”。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最终朱元璋取得胜利，于1368年建立了明王朝。随即派大军扫荡山东、两河，直取大都（北京），逐步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在这大动乱、大变动中，人们比较容易突破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精神得到解放。变革现实，犯上作乱，推翻黑暗王朝成为那时的时代精神。一大批才智之士各拥其主，在群雄逐鹿中大显身手。他们有的出身微贱，有的是一介寒儒，但在建立明王朝的战争中建立了功勋，取得显赫的地位。人们在元代说书的基础上，以《三国志平话》为框架，集大小本的水浒故事为素材，灌注进时代精神，创造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王冕、刘基、宋濂、高启等人的诗文作品，也一扫元代诗文的柔弱纤细之风，发出了揭露黑暗、变革现实的激越豪迈之音，使明初的文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朱元璋出身贫苦，在瘟疫灾荒的岁月里度过了艰难的生活，对人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因此他当了皇帝之后，采取了让农民“安养生息”的方针，在经济上实行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如承认农民在战乱中占有的逃亡地主的土地为己业；移民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减轻赋税；重视种植桑、麻、木棉等经济作物，使农业生产很快恢复发展。同时，把手工业工人从元代的工奴制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趁作”，提高了手工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商业方面则降低商税率，促进商业发展。从洪武到宣德将近七十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繁荣，但是，文学艺术却从元明之际的短暂的高潮后，很快跌入低谷。从洪武中期到成化一百余年，文学创作方面几乎一片空白。其原因主要是朱元璋在政治上极力巩固皇权统治，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使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达到了高峰。为了巩固皇权，大肆杀戮功臣。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案，诛杀胡惟庸，“坐株者三万余人”。加强特务统治，设立锦衣卫，用特务手段刺探臣僚言行，造成恐怖气氛。对封建文人采取笼络和高压的手段。朱元璋亲自筹划，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壮举。他们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元璋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使知识分子不得不竭尽毕生之力去钻研八股文章，背诵“四书”“五经”，思想僵化，脱离现实，很难创作出什么好作品。在笼络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大兴文字狱，造成人人自危，栗栗戒惧的风气，这对文学艺术创作极为不利。朝廷又采取法律、诏令形式，直接干预文艺创作，如《大明律》中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此限。”

在封建专制的重压下，元明之际欣欣向荣的文艺创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摧残。在诗坛上，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台阁体”诗歌盛行；宣扬忠孝节义、神仙道化或美化现实的戏曲作品泛滥文坛；小说创作除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等稍稍表现出文言小说复兴的态势外，长篇小说与白话短篇小说寥寥可数，成就不高。

总之，元末明初出现《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巨著，其后将近百年，小说创作几乎一片空白，这就是明代小说发展的第一阶段。

明代到了中叶弘治、正德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政治角度看，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趋向尖锐、激化；从经济角度看，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滋长；从思想文化角度看，是启蒙思潮的兴起和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因此，小说和其他文学创作开始进入一个繁荣兴盛的阶段。

当时的社会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但农村土地兼并激烈。武宗即位后，大建皇庄，把大片土地分赐给贵族和宦官。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下，失去了土地，被迫逃亡。因此，流民问题成了明代中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流民大量涌入城市，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纺织、冶铁、制盐、铸造、造纸、印刷、制糖等手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分工，促进了雇佣劳动的发展。在苏州当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多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主要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已经出现，这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中的新因素。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更加繁

荣，市民阶层更加壮大。

弘治、正德时期统治阶级已很腐朽、反动。武宗荒淫无道，除了在宫内奢侈淫乐外，还四出巡游，劫掠财物，抢夺妇女，以至“市肆萧然，白昼闭户”。世宗经年不朝，迷信道教，内阁纷争，朝政混乱。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张居正作宰相，执行改良主义政策，还比较开明。张居正死后，神宗亲政，遂日益腐朽和残暴，他的臣下曾给他上“酒、色、财、气”四箴，说他四病俱全，非药石所可治。由于明中叶以来历代皇帝腐朽、昏庸，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政，世宗时严嵩父子专政，以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地方藩王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激化，引起安化王、宁王先后起兵发动“清君侧”的内乱。民族矛盾加剧，嘉靖年间，鞑靼酋长俺答大举入寇。东南沿海则不时遭受倭寇的袭扰。农民战争不时爆发，正德年间刘六、刘七农民暴动，历时三年，涉及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诸省。统治阶级的腐朽奢侈，使奢靡之风日盛。从上到下，尽皆“靡然向奢，以俭为鄙”<sup>①</sup>。这种风气引起社会上争奇斗艳、追求炫人耳目的新鲜刺激，渴望感性欲求的强烈满足，弥漫着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气氛。

在资本主义萌芽滋长的同时，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启蒙思潮。弘治、正德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继承和发展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守仁哲学中“心即理”和程朱理学中的“性即理”的观点是对立的。王守仁反对理学那套束缚人性的教条，动摇了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统治。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李贽的出现，成为“心学的异端”，更掀起了一股猛烈抨击理学、要求人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

明中叶开始，文学创作发生变化，特别是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变化，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诗文方面，最早出现的是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这些复古派在反对台阁体的空廓、浮泛和八股文的恶劣影响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以模拟抄袭古人为能事，所倡导的仍然是一种形式主义。归有光的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李贽和三袁的公安派，提出了“童心说”，要求文学独抒性灵，是一股人性解放的思潮，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在文学理论方面，李贽、冯梦龙等人，要求写童心，写真情，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他们重视小说戏曲创作，把《水浒传》《西厢记》等称为“古今至文”。他们收集民歌，评点小说，有力地推动了市民文学的发展。在戏曲创作方面，《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改变了明初戏曲创作中宣扬封建道德、鼓吹神仙道化的风气，代之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的作品。优秀杂剧作家徐渭，通过《四声猿》等作品，表现了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潮，具有浓厚的反传统色彩。明传奇出现了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吴江派创作成就虽然不高，但对明中叶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唱腔之一昆腔音律的整理有较大的贡献。汤显祖更是受王学左派影响的优秀剧作家，他的代表作《牡丹亭》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幸福的要求，响起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最强音。在小说创作方面，以《西游记》和《金瓶梅》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成为长篇小说的主潮，是明中叶以后成就最高的作品。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小说等也有相当出色的作品。这时印刷业特别发达，不但使出版大量长篇小说成为可能，而且注意对宋元以来白话短篇小说的收集整理加工，使白话短篇小说由说话人的底本发展

为书面文学，其标志就是洪楸《六十家小说》的刊行。这为“三言”“二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文言小说也呈现出篇幅加长，采用半白半文的语言的趋势，并出现了文言中篇小说。

总之，从弘治到万历的一百三十余年间，是明代小说最为繁荣发展的时期，这是明代小说发展的第二阶段。

明末时期，即泰昌至崇祯年间，一直延续到南明桂王永历政权的最后覆亡（1620—1661）。这是明王朝从大动乱到覆灭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矛盾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崛起于辽东地区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统一了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式建立后金政权，势力逐渐强盛。在天启初年占领了沈阳、辽阳，拥有东北大部分地区，对明王朝构成了重大威胁。二是朝廷内部魏忠贤阉党掌权，为了排除异己，镇压东林党和正直官吏，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冤狱，引起阉党与东林党、复社之间长期激烈的斗争。三是人民无法忍受明王朝的残酷压迫，终于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最后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起义军受到双方夹击而失败，清王朝建立。南明的残余势力，几经挣扎，到1661年完全覆灭。

这个时期，在诗文方面有几个特点：一是东林党人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虽不以诗文见长，但他们所写的文章和他们的品格对当时知识分子起了较大影响。既是政治团体又是文学团体的复社和几社，在文学主张上还是学步前后七子，没有多少新见，但其作品充满了对民族危亡的呼号。推崇唐宋派的豫章社艾南英等人，文学主张虽与复社、几社不同，但也从事抗清斗争，作品中充满了爱国激情。二是晚明小品发达，成就也较高，张岱、王思任、祁彪佳等人的作品颇有艺术特色，故有较大影响。三是东林党人张溥等人的散文，如《五人墓碑记》等，作品虽不多，

但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影响也较大。

在戏剧方面，创作风格仍受前一时期吴江派、临川派的影响，成就则不及前一时期。被称为临川派的孟称舜的《娇红记》《桃花人面》，吴炳的《绿牡丹》，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和被称为吴江派的袁于伶的《西楼记》等，是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作品。同时，抨击魏忠贤的剧本不断产生，如陈开泰的《冰山记》，范世彦的《磨忠记》等，与当时出现的谴责魏忠贤的时事小说相呼应，构成了晚明一股创作时事小说、时事戏的热潮。

在小说方面，虽仅短短的二十多年，小说的数量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长篇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人情小说继续发展，而且新出现了才子佳人小说和反映魏忠贤、客氏阉党专权，辽东战事，李自成起义和歌颂民族英雄的时事小说，这两类小说的出现使我国古代中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和完备。“三言”“二拍”的出版标志着短篇白话小说的整理和创作达到了高峰。在它们的影响下，明末清初一直到清中叶，白话短篇小说层出不穷，争奇斗艳。李贽等人进步的文艺思想继续影响着文坛，冯梦龙尊崇李贽，他的文艺思想与李贽一脉相承，对此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明末从泰昌到崇祯，不过二十多年，小说创作继承明中叶以后发展的强劲势头，继续得到长足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这是明代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

## 第二节 在市民文化沃土上成长的明代小说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

底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各有自己的性质、特点、范围、结构形态和社会机能。”<sup>②</sup>人们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上层文化即士大夫文化谈论得很多，在对中国传统文学如诗歌和散文进行深度诠释上也取得了丰富成果，但是由于人们只囿于以儒家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化的观点，以此来研究古代小说、特别是明代小说就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施展，因为明代小说就其主流来说乃是属于市民文化。

市民文化在两宋时期就引人注目了。“宋词、宋文、宋画、宋代文玩及宋代理学，构成了一个精致辽阔而又森严的贵族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之外，另有一种文化崛起，这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粗俗而生动的市井文化。”<sup>③</sup>

在市民文化建构过程中，元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期。这不仅因为元代都市的繁荣为市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更主要的这是由于蒙古族的游牧文化进入中原，“随着原社会僵硬躯壳的破坏，长期被严格束缚的种种和封建社会主体理论离心的思想情绪也乘隙得以暂时抒发”<sup>④</sup>，市民思想、观念、情绪得以抬头，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同时，杂剧也因城市的繁荣而逐步发展成熟了。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叙事时代的开始。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杂剧是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与底层人民第一次精神的遇合。从此民间创作与作家创作的结合成为市民文化与士大夫文化双向流动的一种模式，使士大夫文化不断得到民间文化的滋养，市民文化也受到士大夫文化的熏陶得以提高。正是由于这种结合，在元末明初诞生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巨著。

从宋、元到明初，市民文化虽然已经崛起，但当时的市民经济尚不成熟，资本主义萌芽在经济领域中还没有明显的表现；独立的市民阶层的政治斗争仍未展开，只是农民阶级对抗地主阶

级斗争中的一个参与者；更为重要的是市民阶层尚未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独立的思想体系，传统儒家文化仍然占着主导地位。这时反映市民文化的作品，主要表现了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的思想情绪，商人意识并不强烈。他们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表现“市井细民”生活的愿望，希望朋友间互相帮助，为朋友“两肋插刀”；对英雄人物、功名富贵，充满崇敬和羡慕之情；对色情艳遇津津玩味等等。但这时还未能掀起一股启蒙主义思潮，未打出表现人性、人欲的旗帜，也未提出打碎封建枷锁、企望个性解放的要求。因此，在市民文化中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思想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人的主体意识还比较薄弱。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再到《西游记》，市民意识逐渐加强。《三国演义》中要求君臣平等，知恩必报，甚至像关羽那样为了“恩义”而放弃国家的利益，刘备为兄弟报仇，而置万里江山于不顾；《水浒传》中对市民生活作了精细描写，为朋友公然违背封建法律，“担着血海似的干系”，通风报信，私放“罪犯”；《西游记》中要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要求不服天皇、阎王和人帝的束缚，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等等，都反映了市民阶级的意识，但还没有打出人性解放的旗帜，只是追求着忠孝节义范畴的传统人格，仍然不具备近代市民文化的性质，封建传统思想还占有很大的分量。这从这几部小说忠孝观念的严重、妇女观的落后等表现中，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到了明代中叶，随着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文化便日益壮大起来。在明代，商人为了追逐金钱财物而抛弃了“夜寝早起，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的耕作辛劳<sup>⑤</sup>，也抛弃了农村世界的纯朴、安定和田园牧歌式的欢乐。他们相信“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sup>⑥</sup>，他们内心充满了自信、进取精神。当时在徽州一带，人们甚至“以商贾为第一等



生业，科举反在次着”<sup>⑦</sup>。金钱价值观的确定，标志着物质利益追求已进入意识前沿，意味着人们的关注中心已经从对人格的至善至美的追求转移到对充满世俗气息的、严酷而又生动的现实人生的关怀；从对“内修其美”的沉迷转移到对基本生理欲求的重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享乐渴求。这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时代精神曾经采取了这个转变，它放弃了那个灵明的世界，现在直接观看它的当前世界，它的此岸，随着这样的一个变革，经院哲学便消沉了，消失了。因为它和它的思想是现实世界的彼岸。……于是，人们就来到这样一个阶段，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并争取他们的自由得到承认，并且具有充分的力量为自己的利益和目的而活动。”<sup>⑧</sup>

特别重要的是反映市民阶层要求的理论已逐步形成，王学左派特别是被视为异端的李贽的出现，掀起了追求人性解放的启蒙思潮。李贽正面地亮出了自然人性论的旗帜。他从猛烈抨击假道学入手，公然将心学的核心范畴“心”阐释为私欲之“心”。他力倡“童心”，以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童心焉者也”<sup>⑨</sup>。在他眼里，那些“多读书，识义理”的理学家全都是失却真心的假人。他还进一步把儒家经典推上审判台：“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sup>⑩</sup>这样圣人就不再是圣人了，“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年以前无孔，终不得为人乎？”<sup>⑪</sup>将儒家圣人和理学文化律令放倒并张扬个体价值之后，李贽急切地返回人生真相，他明确地肯定人的私欲、情欲和凡俗的日常生活，他说：“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sup>⑫</sup>，“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仪，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仪可止也”<sup>⑬</sup>。李贽大胆地践踏了僵化的儒家礼教，为形而下